

鲁迅研究丛书

鲁迅和 外国作家

张 华 著

鲁迅研究丛书

鲁迅和外国作家



张 华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目 次

西方思潮对前期鲁迅的影响·····	(1)
鲁迅和尼采·····	(18)
鲁迅和易卜生·····	(37)
鲁迅和萧伯纳·····	(59)
鲁迅和爱罗先珂·····	(72)
鲁迅和有岛武郎·····	(85)
鲁迅和托尔斯泰·····	(104)
鲁迅和厨川白村·····	(129)
鲁迅和契诃夫·····	(153)
后 记·····	(167)

西方思潮对前期鲁迅的影响

一九二五年，北京的京报副刊曾经征求过青年必读书。鲁迅的回答是别开生面的：“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但在附注栏内，又写了些颇为发人深省的话：“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①

这一段话是对当时甚嚣尘上的“整理国故”的逆流的猛烈抨击，立刻就遭到了不少的责难和谩骂。现在看来，鲁迅的这段文字虽也未 尽 公 允和准确，但这却决不是一时的愤激之辞，而是他的深刻体验，是他多年来读书经验的总结。

鲁迅的青少年时期，正当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摆在每一个中国人面前的最紧迫的任务，就是拯救自己的祖

国。为了救国，他去学医，又为了救国，他觉得学医的路子不对，改习文艺。他是为了爱国主义的崇高目的去进行文学活动和启蒙教育的；他接受前人的思想，也是为了寻求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

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从十九世纪末到本世纪二十年代初，主要反映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所谓“外国书”，成了鲁迅的主要读物；传入中国的各种西方思潮，都引起鲁迅的极大兴趣，想用它来试一试能不能救中国，能不能用来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和达到使祖国富强的目的。用实际的革命斗争这块试金石，对各类西方思潮进行检验。通过分析、消化、吸收和淘汰，这些思潮的有益部分为鲁迅前期世界观的形成提供了思想材料；同时，也因为他还没有来得及分辨出西方思潮中的各种派别和倾向，使他前期思想呈现出复杂的面貌。



上一世纪末到本世纪初，传入我国的西方思潮种类繁多庞杂，大约分别为三大类：一类是以卢梭、孟德斯鸠为首的十八世纪法国启蒙主义者的民主主义思想，以卢梭的天赋人权论为代表；一类是以达尔文和斯宾塞等人为代表的进化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严复的《天演论》在传播这一思潮中起了重大作用）；一类是无政府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思潮，这是上一世纪末流行于西方的，也被当作新思潮介绍进来，这里有施蒂纳、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叔

本华、尼采等人的极端个人主义哲学，这一类学说对当时社会和传统的貌似革命的猛烈攻击，颇激动了一些有志于改革的青年的心。

西方这三类思潮传入我国以后，中国第一代民主主义革命家便对它们如饥似渴地兼收并蓄，认为这些东西都是救中国的良好药方。由于鲁迅积极参加了民主革命的斗争，由于鲁迅救国救民的崇高志向，他当时也就十分振奋地接受了这些东西，启蒙主义者的思想为他革命民主主义世界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进化论在鲁迅手里，同人性论相结合，形成了人性发展进化的思想。尼采的超人哲学，经过改造，也构成了鲁迅人性进化论的思想材料。这样，鲁迅前期，大约在一九二五年以前，基本上锤炼了一种人性进化的思想，来作为反帝反封建的武器，也就是他革命民主主义世界观的理论形态。

二

现在鲁迅研究者中间有一种相当普遍的看法，认为鲁迅前期，一方面受了达尔文进化论和尼采哲学的影响，而另一方面又从实际的革命斗争中产生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这种民主主义思想逐步发展壮大，克服了进化论和尼采哲学的偏颇，从而形成了鲁迅前期的民主主义世界观，并为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作了准备。

这种看法，反映了鲁迅思想发展的部分实际情况，但也有重大的缺陷：第一，它忽略了鲁迅所接受的西方民主主义

思潮的影响；第二，它把进化论和尼采哲学看成是和民主主义思潮绝对对立和相互排斥的，而忽略了在鲁迅思想发展中，各种思潮的关系，呈现着相当复杂的状态。

认为鲁迅前期，通过实际斗争，总结了斗争的经验，产生了民主主义的思想，这自然是完全正确的。列宁曾经说过，由于每个民族都存在被压迫阶级和这个阶级对统治者的斗争，必然会产生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文化。但现在的问题是，仅仅是对实际斗争经验的总结，鲁迅就能形成革命民主主义世界观吗？我们以为是不能的。鲁迅民主主义世界观的形成，自然植根于两个世纪之交中国的社会环境，反映了千百万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人民的革命要求。但是民主主义世界观作为革命的资产阶级的完整思想体系，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它的形成经历了一个长久的历史过程。从十四世纪后半期至十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潮的勃兴开始，到十八世纪美国和法国两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提出的基于天赋人权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经过了数百年的声势浩大的内容深刻的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斗争，才锤炼出这样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由于我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在帝国主义侵略下，资本主义经济得不到长足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先天虚弱，也没有掀起触动到社会底层的深刻的革命运动，所以自己不可能建立完整的革命思想体系，而必须借助于先进国家资产阶级的理论学说来锤炼自己的精神武器。

事实也正是这样，十九世纪末叶以来，凡是立志改革的

先进的中国人，不论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都大量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的革命思潮。本世纪初，著名的青年革命宣传家邹容在其发行量很大的《革命军》一书中阐发了卢梭的天赋人权学说，著名的西方思潮介绍者严复翻译了《法意》，而在一九〇二年，也就有了杨廷栋所译的《民约论》刊行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法国启蒙思想家，特别是卢梭、孟德斯鸠的学说，培育出我国第一代民主主义革命家。

作为当时民主革命阵营的一员战将，鲁迅自然也受到启蒙思想家的熏陶和感染。他前期的民主革命理想，他的提倡发展个性，主张人性解放，强调精神、理性的作用等一系列观点，显然来自卢梭等启蒙思想家。在他们的著作和思想的影响下，鲁迅才形成了革命民主主义的世界观。

从鲁迅的前期著作中，我们也看到他对杰出的启蒙思想家，一直抱着极为推崇和敬重的态度。他曾对卢梭作了这样热情的赞颂：

“卢梭、斯蒂纳尔、尼采、托尔斯泰、伊孛生等辈，若用勃兰兑斯的话来说，乃是‘轨道破坏者’。其实他们不但是破坏，而且是扫除，是大呼猛进，将碍脚的旧轨道不论整条或碎片，一扫而空……”②

由于卢梭和当时的鲁迅都是反封建斗士，都站在民主主义立场，因而鲁迅对卢梭能有这样深刻的理解，对他与封建制度和传统彻底决裂的不妥协精神，把握得非常真切，并且作了极其生动的淋漓尽致的描述。

鲁迅还热情地讴歌了西欧北美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特

别是卢梭等启蒙思想家的思想直接影响下的法国大革命的伟大历史功绩。他说：封建君主“以一意孤临万民，在下者不能加以抑制，日夕孳孳，惟开拓封域是务，驱民纳诸水火，绝无所动于心；生计拙，人力耗矣。而物反于穷，民意遂动，革命于是见于英，继起于美，复次则大起于法朗西，扫荡门第，平一尊卑，政治之权，主以百姓，平等自由之念，社会民主之思，弥漫于人心。”③

鲁迅在赞颂卢梭和外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同时，又喟然慨叹当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潮到来之际，却又严重缺乏象卢梭那样精神界的战士和巨人。他说：

“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家国荒矣，而赋最末哀歌，以诉天下貽后人之耶利米，且未之有也。”④

又说：

“志士英雄，非不祥也，顾蒙帼面而不能白心，则神气恶浊，每感人而令之病。奥古斯丁也，托尔斯多也，约翰卢骚也，伟哉其自忏之书，心声之洋溢者也。若其本无有物，徒附丽是宗，辄岸然曰善国善天下，则吾愿先闻其白心。”⑤

由于资产阶级先天软弱，必然造成资产阶级革命队伍参差不齐，鱼龙混杂，一方面，嘴里说些“善国善天下”之类言不由衷的话，内心世界却是见不得人的政治投机者，混迹于革命队伍之中；而另一方面，象卢梭那样从内心发出至诚

之声的精神界战士，又那么稀少，这就引出鲁迅的很深的感触。在我国具体历史条件下，要造就一代坚定的民主主义革命家是十分艰难的。象孙中山、鲁迅、秋瑾、廖仲恺、朱执信、何香凝那样从本世纪初或更早时候起，就毕生坚持革命而又多少具备比较完整的民主主义世界观的人是为数不多的。而没有一大批坚定的战士作为革命中坚，正是后来辛亥革命终于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些情况表明：鲁迅前期确实受到西方民主主义思潮的重大影响。这里主要提到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的影响。此外，十九世纪欧洲进步的和民主主义的作家诗人的影响，也应属于西方民主主义思潮的影响。这些在《摩罗诗力说》中讲得很清楚，我们就不多援引了。

三

民主主义思想的理论形态是人性论。从文艺复兴时期提出的人文主义或人道主义，到启蒙思想家的天赋人权论，直到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人性论都是其核心。这种尊重人、关怀人、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突出了人，同封建宗教的神相对立，同神授君权相对立，提倡个性解放，反对封建制度和封建道德对个性的束缚，有极为鲜明的反封建革命意义。从天赋人权出发，又发展为“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和民主共和国的方案，直接得出政治上民主主义的结论。列宁在他的名著《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怎样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一书中正确指出：包括卢梭在内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他们的学说

都是从人类天性出发的。

鲁迅前期的思想也是这样。他要求的是人的本性的健康发展和进化，人性的解放和国民性的改造。数千年来积累起来的成法束缚了人性的发展，封建的伦常和礼教阻碍了真正的“人”的成长，病态的社会和腐朽的习惯道德造成了国民性的痼疾。他从要求人性解放这一点出发，向封建反动势力无情地宣战，认为只有推翻封建势力，人性才能发出灿烂的光辉。鲁迅又把人性问题归结为中华民族国民性改造问题，由于异族的侵略而使国民性遭到玷污，导致民族的消沉和衰落；而只有国民性的改造，群众精神的健全，民族的觉醒，才能从根本上聚集起力量来抗击列强的侵略。这样，理想人性的发扬这一个古今中外哲人感兴趣的抽象议题，在前期鲁迅手中就成为反帝反封建的一个锐利的思想武器。

鲁迅在一九〇七年所写的几篇文章，就已着重宣扬了人性。在《科学史教篇》中，他认为科学的昌盛可以发扬人性：“科学者，神圣之光，照世界者也，可以遏末流而生感动。时泰，则为人性之光，时危，则由其灵感，生整理者如加尔诺，生强者强于拿破仑之战将云。”不过他又认为仅仅推崇科学知识也流于偏颇，只有同时提倡科学与艺术，才能“致人性于全，不使之偏倚，因以见今日之文明者也。”⑥

在《文化偏至论》中，鲁迅突出地把“立人”放在首位，进一步强调了个性解放问题：“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位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假不如是，搞丧且不俟夫一世。”⑦认

为只有发扬个性，才能振兴民族使国家独立富强。他指出：“盖自法朗西大革命以来，平等自由，为凡事首，继而普通教育及国民教育，无不基是以遍施。久浴文化，则渐悟人类之尊严；既知自我，则顿识个性之价值；加以往之习惯坠地，崇信荡摇，则其自觉之精神，自一转而之极端之自我”。⑧这里鲁迅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在平等自由思想得到普及的社会环境中，人们才开始认识个性的价值。这种看法符合历史实际：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得彻底的社会里，相对于封建制度来说，人们是得到一定程度的个性解放的。鲁迅又敏锐地看出：在资产阶级取得稳定统治之后的国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个性解放论的个人主义本质开始暴露，极端个人主义思潮开始兴起。只是鲁迅这时还不能看出：这就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封建革命性开始褪色，而它的消极性甚至反动性已充分显露出来了。

到了“五四”以后，鲁迅的人性论思想同进化论思想有了进一步的结合，发展成为比较完备的人性进化思想。

四

达尔文的进化论是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伟大发现，但是在上世纪末经严复翻译《天演论》将它介绍到我国后，却在思想界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这里有达尔文本人的影响，也有斯宾塞、赫胥黎等人思想的影响，也有译述者严复本人的思想影响，情况比较复杂。总的说来，虽然达尔文和他的追随者如赫胥黎等人常不伦不类地企图用进化论去分析解释

社会，但进化论作为自然科学学说是无力解释社会的。要研究人类社会，如鲁迅后来指出的那样：“须‘从生物学到社会学去’，须从达尔文的领域的那将人类作为‘物种’的研究，到这物种底运命的研究去。”^⑨从十九世纪以来，所有热衷于将进化论用来分析社会的企图，都是不科学的。

但是，同是用进化论来研究社会，由于各人所持的立场和世界观的不同，得出的结论也是不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抓住生物在生存斗争中自然选择适者生存这一点，断言人类社会也是弱肉强食的，“强者”剥削阶级理应压迫“弱者”劳动人民，帝国主义理应侵略弱小民族，甚至劳动人民在旧制度下失业、饥饿以至死亡，都被认为是“自然选择”的必然结局。这是一种公开为帝国主义辩护的反动理论。庸俗进化论者庸俗地理解进化论，扩大了其中的缺点，走到了否认质变、否认内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的地步，用这种观点曲解社会现象，得出不要革命，满足于点滴的进化和改良的结论。

鲁迅多次谈到他曾经相信进化论。这句话不仅指他相信进化论这一自然科学学说，也含有他曾以为进化论是可以用来解释社会现象的意思。鲁迅是从民主主义革命者的立场，用进化论去剖析社会的。因此，他首先斥责社会达尔文主义：“盖兽性爱国之士，必生于强大之邦，势力强盛，威足以凌天下，则孤尊自国，蔑视异方，执进化留良之言，攻小弱以逞欲，非混一寰宇，异种悉为其臣仆不嫌也。”^⑩他

斥责以进化留良为口实去侵略别人的帝国主义者兽性爱国者，主张“力抗强者”，反对侵略。

鲁迅所强调的是进化论认为生物由低级到高级发展进化这一点，从而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人类一代代不断进化，由低级到高级的向上发展。强调了社会的发展，反对了顽固派抱残守缺不肯变革的观念，强调了由低级到高级的不断进化，增强了变革者的乐观主义，使他们对前途充满了信心。

这里应当注意的是，鲁迅所说的人类进化、向上发展是什么意思。如果严格按照达尔文主义去推论，只能理解为人体更加强壮健康，器官改进更加适应环境，生存能力特强等等。但是鲁迅并没有拘泥于这样的理解，他把进化论同人性论结合起来，赋予它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内容。他认为人类的进化即人性的发展、进化、日臻完善，美好人性一代代的发扬就会导至尤为高尚尤近圆满的新的种族出现。早在一九〇八年他就说：“夫人历进化之道涂，其度则大有差异，或留蛆虫性，或猿狙性，纵越万祀，不能大同。”^⑪他认为人类进化是不平衡有差异的，但总是发展向上，不断摆脱兽性，远离动物，而迈向理想人性的高峰。他说：“是故嗜杀戮攻夺，思廓其国威于天下者，兽性之爱国也，人欲超禽虫，则不当慕其思。”^⑫愤怒地指斥帝国主义侵略者是没有摆脱兽性的。

在“五四”时期的杂文中，鲁迅人性进化思想得到了充分的阐述和进一步发展。他以为人类经过一代代的生死更

替，将摆脱掉昏乱残暴愚昧种种劣根性，使一代比一代有进步，超越前代，在生命延续过程中得到进化，这样冲破社会上的各种阻碍，不断向上不断前进，就会有真正的“人”的出现，即具备着完善的健康的人性的人出现。

为了使这一进化过程圆满实现，鲁迅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号。要完成进化必须使新一代超过旧的一代，所以就要把着眼点放在孩子身上。鲁迅为此提出要算清旧账，勾销几千年封建礼教的重压，“完全解放我们的孩子！”为了解放孩子，老一辈不但不应该占尽道路阻挡少年前进发展，而应该乐于牺牲用自己身躯填平深渊让少年前进，也就是“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⑬

鲁迅把这种见解称之为“以幼者为本位的道德”，正因为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所以前者的生命应牺牲于它。在当时，鲁迅这种新颖的革新的见解，是对封建礼教伦常以至整个封建意识形态的一个猛烈的冲击。这种思想是同封建的所谓父为子纲的以“以长者为本位”的思想根本对立的，鲁迅把后者斥之为东方古传的谬误思想。他指出：认为父母有恩于子女，子女应报父母养育之恩，要幼者为长者作牺牲；这些传统见解都有悖于进化，是长者的卑鄙利己主义的表现。鲁迅主张用爱来结合长与幼，他指出长者爱幼者是生物的天性，也是人类的自然本性，这种天性促进了生命的延续和发展，因而是应该保持和发扬的。人们应将这天性的

爱，更加扩张，更加醇化，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

由以上对鲁迅的人性进化思想的简述中可以看到，它的反帝反封建的锋芒是一目了然的，在当时具有革命性。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它也有其局限性。那就是当时鲁迅企图通过人性进化思想的宣传，着重点放在“救救孩子！”上，以改造国民性，完成思想革命，来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鲁迅说：“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⑭他又说：“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⑮这种过分看重启蒙的手段，强调说服教育的观点，一直延续到一九二五年初。这应该是进化论思想带来的副作用吧！

五

十九世纪末以尼采、施蒂纳等人为代表的极端个人主义思潮，是资产阶级在欧洲已趋向反动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它实际上是对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民主主义思潮的反动，二者是根本对立的。但另一方面，卢梭也曾被人称为个人主义之父，他的学说也带有浓重个人主义色彩，因此十九世纪末极端个人主义思潮又是卢梭等启蒙思想家学说合乎逻辑的蜕化，即资产阶级由革命走向反动这一蜕化过程的反映，二者又有一定的同一性。这就是鲁迅在接受民主主义思潮决定性影响的同时，又能接受尼采等人若干影响的原因。鲁迅把尼

采的超人，看成是人性发展的极致，把施蒂纳的自我扩张的无政府主义叫嚣，看成是挣脱封建的束缚和镣铐，鲁迅实际上是利用尼采、施蒂纳的某些思想材料，来发挥他自己一种个性从封建意识形态羁绊下解放出来的理想，用来为他的人性进化思想服务的。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哲学是有党性的，鲁迅在他前期没有识破尼采等人哲学反动本质时，尼采等人的哲学不可能对他没有一点消极影响。这首先影响到他对群众力量的认识，这一点鲁迅研究者中看法比较一致，其次影响到他对资产阶级民主制的认识，这一点大家看法还有很大的分歧。

鲁迅的前期思想主流是革命民主主义，但也存在若干无政府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杂质。例如他将卢梭称为革新的破坏者，但又将尼采、施蒂纳（鲁迅写作斯契纳尔或斯谛纳尔）等人与之相提并论，也称之谓偶像破坏的大人物。又如他既肯定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在反封建斗争中的巨大历史作用，却又认为这一制度是“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古之临民者，一独夫也，由今之道，且顿变而为千万无赖之尤，民不堪命矣，于兴国究何与焉。”^{①⑥}虽然这两段话，当时矛头是指向搞君主立宪把戏的维新派，不过在理论概括上却是偏颇的，可以明白地看到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

但是对以上清楚地表现了鲁迅思想弱点的两段话，近来却被不少鲁迅研究者认为是鲁迅极其卓越的思想，以为“在十